



渔村北海

文 / 江单

南海之北, 有一海港, 因在南海最北端, 亦因北面向海, 古曰北海。

北海之名, 始于清代。光绪末年, 国运黯淡, 北海被迫通商。因此也留下了一条法国风情的北海老街, 老街的法式建筑风格, 实很突兀。诸多人不知晓的是, 现在的繁华商业街, 却是当年的国耻记忆。

依我看来, 按照古代中国城池“山南水北为阳, 山北水南为阴”的命名惯例, 北海唤为海南貌似更贴切。

北海之美, 莫过于大海。各地之海皆类似, 无非水清水浊之分。北海之特色, 在于沙滩。北海的沙滩, 和别处不同, 沙细而白, 阳光打过, 有如银光点点, 遂名银滩。

早晨的银滩, 沙滩上满是小洞, 洞边一堆颗粒状沙砾。此为沙蟹杰作。

沙蟹形似螃蟹, 却只有小拇指大小。一眼望去, 满沙滩上都是四处奔跑的沙蟹。人一近身, 沙蟹飞

似地钻入小洞, 其状让人不由会心一笑。

银滩的沙, 应赤脚踩踏。如母亲之手, 轻抚脚底, 惬意之感, 不由言说。

北海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城市, 城市虽不大, 却颇具风情。街道两旁多果树, 高高在上的椰子树, 枝繁叶茂的桂圆树, 让整条街道似乎弥漫着一股水果清香。

当地朋友说, 果实成熟之时, 爱以小电驴为代步工具的北海人都会带上安全帽, 生怕果实掉下来砸到自己。

北海街道两旁的果树也是行道树, 却不全部是市政所种, 有些树的产权还归属私人, 这倒是北海一善政所在。

北海为半岛, 海水倒常见, 山就显得尤为珍贵了。半岛西部海边有一小山, 曰冠头岭。这座两百米海拔的山诚然比不上我家乡的雪峰山, 但因生在北海, 于是成为一胜地。

山顶观海, 确有东临碣

石以观沧海的感觉。四周皆海, 海天一线, 各式船星星点点, 更添沧桑。

千百年前, 中国的瓷器、丝绸就从此登船, 去往遥远的阿拉伯, 甚至更远的鹿特丹、内罗毕。

北海的渔民应和我家乡的乡民般, 都是勤劳善良的。他们日复一日地出海, 日复一日地打渔。

出海打渔是一个风险颇大的营生, 一网下去, 有满载而归者, 亦有空网而回者。如遇风暴, 血本无归倒是其次, 留得命回就已不错了。

渔民们大多在避风港中有一水上之家。铁皮小屋建在木板上, 浮在海水里, 四周为诸多网箱, 渔民在铁皮屋中忍受炎热、不便, 只为艰辛的生活。

北海曾属广东, 后才划归广西。所以, 北海人拥有了广东人的精明, 却又不失广西人的实诚。

夫人有一北海朋友, 在当地从事教职。得知我们到来, 她给家中的老母亲

做好晚饭, 才骑着小电驴来到我们下榻之处。晚十点多回家后, 又忙工作至深夜。

因北海常年的高温, 这位朋友和其他北海人般, 肤色稍黑, 不善言辞, 却能让人感觉到她的真诚。

可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北海就是一个大渔村。每个村庄都拥有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港中停着诸多渔船, 大多上面挂满了灯。待到晚上, 出海之后, 灯光一亮, 海中的水生动物着了魔地聚集过来, 就成就了渔民的丰收。

北海人打渔, 也不赶尽杀绝。每逢春季, 就成了当地的禁渔期。看来, 北海渔民深谙古训, 为了谋生, 只得向大海索取, 然凡事有度, 休养生息之后, 才会迎来大自然的回馈。

而北海之外的很多地方, 为了一己之欲, 索取无度者, 却不在少数。

由此看来, 今人不如古人者, 何其多也。

讨好上级蒋介石 戴笠用这五招

文 / 掌上历史

对于蒋介石的防范, 戴笠也知道, 目前时机尚不成熟, 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抚平“老头子”的疑忌心理。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 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 戴笠使出了“五招”。第一招是表忠心, 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 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 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 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 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 加强戒备。一时间, 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 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 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 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 敢说话的, 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 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 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 赴美争取美援, 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

久。在此期间, 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为加强对美外交, 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 但宋子文为提高身价并不急于赴任, 仍滞留美国。1942年, 戴笠给宋子文发电, 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 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 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 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 久而久之, 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 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西安事变”以后, 戴笠留给宋美龄的印象也不坏, 他抓住机会大献殷勤, 运用各方面关系, 增强了宋美龄对自己的好感。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 在蒋介石心目中, 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 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 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 抱成一团。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 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 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 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

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 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 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 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 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 戴笠不好拒绝, 但他采取后发制人, 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 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 虽是帮办, 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 深感戴笠不好对付, 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蒋介石提出, 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 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

宣铁吾等人组成, 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五人中, 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 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 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 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 表面上看, 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 但还是相互利用。以胡宗南的为人, 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 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 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 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 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 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 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滑之处。

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 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

当报纸只剩一种声音, 是良知的丧失

文 / 草川人

这半年来, 小编一直在检测一些地方的报纸(全国性的知名报纸除外), 发现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这半年来, 很少再能见到对各行各业的监督报道。甚至连当地的火灾等小型灾难性报道都很少见其踪影了, 即便是报道, 也只是赞扬和歌颂灾难救助中的“英雄”身影, 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没有一家会采访报道灾难的原因。

对于传媒而言, 一旦缺少了监督报道, 只剩下一种声音, 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宣传单”, 失去了“天平”的意义。久而久之, 普通民众就会远离这样的报纸, 认为再没有必要关注, 因为没有关注自己的生活, 远离了民众内心真实的声音。当然除了网络媒体的正面冲击之外, 这也是当下很多都市类报纸被民众抛弃的重要原因。

我一直在想, 同样面对网络媒体的广泛冲击, 《新京报》为什么能照样办的风生水起呢? 原因是这张新闻纸始终坚持说真话, 挖掘一些事件背后的独家新闻。比如前两年《新京报》推出的关于四川大凉山地区孩子上下学通常要爬的天梯, 尽管当地政府使出了各种招数, 但报道一天接一天, 每天都是“新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为这些孩子解决上学难的问题, 就是要逼迫当地政府修出一条路来。当然, 通过报道, 问题解决了。

你说, 面对这样的报纸, 有哪个普通民众不喜欢呢? 这样的报纸, 在国内已经屈指可数, 小编所知道的也只有《南方周末》《成都商报》《华商报》《南方都市报》等几张了。可是, 当你进入一座城市, 买一份当地的都市类报纸, 再找一份当地的大报发现, 新闻基本都是雷同的, 他们基本像孪生兄弟, 不分彼此。如果这样, 何必必要劳民伤财, 有那一份报纸就足够了!

以上是从传媒本身而言的,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后果。当民众打进新闻热线, 想让媒体参与监督时, 媒体满口答应, 也登记了线索, 就是不派记者, 民众要求的监督泡汤了。这其实是对一种“民众诉求通道”的堵塞, 诉求没有得到解决; 接着他们会选择网络举报, 但现在网络是实名发帖, 后台只要一查, 立即知道谁发的贴, 民众又担心会遭到打击报复。根据《南方周末》昨日的报道, 三月份有奶农网上举报某奶制品企业, 4月就被跨省抓捕了!

总之, 当媒体只剩一种声音, 遍地都是“美好”的报道, 有意地将那些生活的阴暗面隐藏起来, 久而久之, 势必会形成后患。当媒体只剩一种声音, 也是媒体良知的丧失, 他的存在, 已经不能起到公器制衡的作用。

